

# 走进麦德布利书店

盖 双

作者简介 盖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教授（北京 100029）

麦德布利这个名字，在埃及知识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所创建的麦德布利书店更是声名远播。但凡来到开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对阿拉伯书籍感兴趣的外国人，绝少有不光顾这家书店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近几十年在埃及留学、深造的学生和学者，恐怕也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前不久，我终于有了头一回去埃及的机会。行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少华教授就在电话里一再叮嘱：“咱们怎么也得腾出一天工夫去书店啊。”我说：“好，要去就去麦德布利。”

其实，自己想去这家书店的目的，与其说是买书，不如说是想到那里实地看看，留意同仁撰就的书话类作品，想发现那些数量不多却非常生动地记述逛书店、遛书摊的篇什，在日后“天方书话”的专栏中，照猫画虎地写一篇。经过反复比较，目标选定为麦德布利书店。

该书店创办者麦德布利先生，全名是穆罕默德·麦德布利·穆罕默德。人们称呼他时一般在前面还要加上两个尊称：一是“哈吉”，表示他去麦加朝觐过；二是“谢赫”，此称谓用于他，倒不是领袖或权威的意思，而是取其原意，亦即通常所说的长者，这对麦德布利来说，既亲切又贴切。他是个从小满街卖报、一辈子没上过学的人，加上他的籍贯是上埃及，更让他身上添了点土味儿。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半个多世纪里为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精英阶层提供了无数精神食粮。他所创建的书店，如同中国的三联书店一样，也从一个单纯卖书的地方，发展成为正规的出版机构，而且成为全埃及最大的私人出版机构。昔日小报童，今日大书商，麦德布利正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对于自己的出身，他非但从不自卑，反而颇为自豪，声称：“我是图书出版这个世界里唯一一个上埃及人！”

麦德布利书店位于开罗市中心塔勒阿特·哈尔布广场旁边，这是他坐镇的总店。开罗是个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极为雄厚的城市。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一般游客来说，走马观花地参观几大名胜古迹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常来度假的阿拉伯人和有充裕时间得以细细品味这座城市的非阿拉伯游客来说，盘桓于这个不大的街心广场、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消磨些许光阴，或许也是“开罗文化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看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塔·哈尔布（1876~1941）的塑像，他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于1898年创建埃及国民银行，被视为埃及金融独立的奠基人，亦被称作现代埃及经济之父，广场即因他得名；二是丽石（Rish）咖啡馆，它原为德国人所开，后转手法国人。因已故歌后乌姆·库勒苏姆等各界名流常光顾此处而享有盛名，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都是常客之一；三就是麦德布利书店。

当麦德布利书店宽不过5米的陈旧门脸进入视线时，我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些失望。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我和同伴们走进书店，还未来得及仔细观察这个面积绝对说不上大的“正店”时，书店的大伙计已经带着我们走出大门悄然向“副店”走去。正、副两店相距十几米，略带几分神秘色彩的副店没有什么招牌或标记。看上去这里原先应该是个住家，一个门厅，然后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左侧有3、4个房间，除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有门，其他的皆可直接进入且间间相通。上下左右都陈列着密密匝匝的书，在统共不过1米来宽的走廊上，两边竖着顶天的书架不说，地上还堆着高低不等的书籍。若是两人迎面而过，即便同时侧身也免不了身体接触；若是一人踩着颤巍巍的梯子爬上去看书，别人就得等他下来再说了。

副店，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因为想不出更恰当的字眼。这令人回想起早年北京八面槽有过的一家外文书店，那里专卖影印的外文辞典。大家知道，当时中国还未参加版权公约，只是也觉得这样做不

太合适,故对购书者加以限制,尤其对外国人更是如此。这种店中店的形式,想必都有某种原因,麦德布利书店恐怕也不例外。

麦德布利创业至今究竟惹了多少官司,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有一些是难忘的,其中有24宗是因关涉“国家安全”而引起的。这也是这家看似不起眼的书店为何在阿拉伯世界名声大噪的主要缘由之一。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麦德布利居然能够次次有惊无险,没进过一天班房。

因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利,阿拉伯各国民怨四起,矛头直指纳赛尔总统。麦德布利书店就由于出版了一些反对纳赛尔政策的书籍、代销了尼扎尔·盖巴尼的诗集《灾难记事本的边角角落》而遭到指控,罪名是该诗集中有反纳赛尔言论。在接受调查期间,麦德布利一边辩称自己只是代销且已无存货,一边让诗人立即亲自给纳赛尔写信对诗中的观点进行解释,同时提醒诗人一定要随信附上一本诗集。几天后,内政部官员来到书店宣布:经纳赛尔总统本人同意,此诗集可以继续销售。结果,不仅罪名不复存在,而且盖巴尼又给他发来诗集1万册,几天之内便告售罄。

麦德布利书店还因出版了阿拉乌·哈密德的《一个男人理智中的距离》一书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麦德布利又被告上法庭,宣判监禁8年。结果,进监狱的不是出版商麦德布利,而是该书作者。原来麦德布利作为一个四朝元老(革命前,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现在),早已在多年摸爬滚打中得出一条宝贵经验——事先与作者签一专门协议,声明只管出书,文责自负,不签不出。正是靠了这一条,他才躲过一劫又一劫。当然,他所遇到的麻烦不只如此。由于出版发行过一些对原教旨主义持不同看法者的书籍,他本人多次受到极端分子的恐吓和威胁。对此,今年已67岁的麦德布利态度十分坦然,他曾对记者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吧,我的书店出版的书有5千多种,卖过的书达50万种。书是传播知识的媒介,是照亮人们头脑的明灯,是解决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麻烦和困难的钥匙。从这点讲,我也算是给埃及的文化事业做了贡献了。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真主给了我这份职业,我就尽力把它做好。有时我并不赞成一些作者在书里写的那些话,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不

喜欢那些话就不让人家说话。因此,我从没对自己出过的任何一本书感到后悔,尽管其中一些差点儿把我送进监狱或者给我带来危险。”

我的几位同伴或许不知道,我们这样快地被引到副店,实际上是享受了某种待遇。2003年一位《中东报》记者采访了麦德布利,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麦德布利先生对能够为顾客提供不经书检和警示的读物颇感得意。这也成为这家书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人们频繁光顾这里的原因。店里的大小伙计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每当他们看到有与众不同的、有特殊需求的顾客走进书店(正店),他们中的一个便会立即凑上去,用别有意味的眼神冲顾客挤挤眼,建议他们到另一层(副店)去,同时小声道:‘我知道阁下想要什么,只管随我来,您会很高兴地看到另一些书。’当你来到另一层,你会发现书好像还是那些书,但却用另一种方式摆放着,此刻一种超越禁忌的感觉会在你心里油然而生。这就是经商的埃及人机灵的一面。”至于书店伙计如此迅速地给予我们这种待遇的动因,我想大概是这几条:外国人,懂阿拉伯语,是学者,直扑“麦德布利”的迫切等。

不过,当书店伙计问我们想找哪类书而得到的回答是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时,但愿他没感到失望。虽说他没听到政治或宗教等敏感字眼,但卖出一本教人如何做焖蚕豆的书与谈论现行政治体制的书,对于书店的效益都是一样的,他们还不至于以专售禁书为己任。麦德布利书店有这一类书出售,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个公开的秘密。这既说明麦德布利作为一个私人出版商的身份比较特殊,也说明政府书检机关虽有严格的制度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埃及的书检机关一般在一本书正式出版发行后发现问题再行查禁,出版商已经印好的书,除非你能将其一网打尽,否则总有漏网之鱼。连麦德布利本人都承认:“在现在的埃及社会里,我们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

那位《中东报》的记者曾特别强调副店的书“用另一种方式摆放着”。但他说的摆放方式在我们看来却是很正常的,只是与正店的略有不同。正店的书大都封面正对顾客,有点像阅览室的摆法;副店的书除了到处堆放的,大多插放在书架上即书脊对

着顾客，当然总体感觉有点零乱。副店的方式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其中暗藏何种玄机，一时难以参透。我只知道图书馆和很多书店以及每个人家里的书都是这样放的。当书脊对着你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我们的汉语有一大优点，就是书名无论写在封面还是书脊，皆可一目了然。阿拉伯语就不同了，你必须拧着脖子看，时间长了很累。加之店内空气令人憋闷——好像没有窗户，只有几个老态龙钟的旧式电扇在高的屋顶上慢条斯理地转着圈圈，所以每隔一会儿不得不到店外透气。

在小伙计的引领下，我去正店拜见麦德布利先生。老人家与我间接印象（看过两篇关于他的文章以及照片）中的一模一样，个头不高但身板很厚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尤其身上那件深灰色的上埃及传统长袍让人感到他的朴素和平易。虽然他是个经常被媒体采访的名人、家财无数的富人和出版界的强人，但当你看到这件长袍时，你与他之间的距离感就会立刻消失。这件长袍已成为麦德布利的标志。他几十年来一直穿着它，即使出国参加书展也从不换行头。他总是说：“我要不穿它，我就不是我了。”然而，身穿这样一件普通长袍的平凡老人，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938年，麦德布利出生在与开罗毗邻的吉萨省，籍贯是上埃及索哈杰省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以卖报纸、杂志为业，他从6岁起就开始帮助父亲卖报，从小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一生从未上过学，但纷繁的社会无疑也是一所大学，这使他成为一个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据说在他8岁的时候就想和弟弟一起离开父亲单干，由于年龄太小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951年埃及新闻从业者工会制做了一些报亭出售，他的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购买了一个。有了固定的售报摊位。父亲去世后，十几岁的他挑起了大梁，弟弟也退学帮他操持生意。他俩敏锐地察觉到销售外文报刊杂志利润较高，便将此类报刊作为主打品种，结果名利双收。事实证明，与外国人打交道是麦德布利书店得以名扬阿拉伯世界的法宝之一。

1956年由于埃及政府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发了著名的三国入侵战争，导致大量外国侨民离开埃及。这使专做“外”字号生意的麦德布

利遭到致命打击。但他还是起死回生。一是由于这次战争使得埃及民众开始对战争题材的书籍及相关名人传记产生了兴趣，他随即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有关丘吉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人的书籍；二是恰逢各种思潮泛起的时代，青年人的求知欲异常强烈，希望了解各式各样的主义和流派，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艺术的。于是，他不仅出版了包括列宁著作在内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左派读物，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以存在主义闻名的萨特和其他西方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作品。嗣后他总是不得得意地对别人说：“别看我没上过一天学，萨特是我首先译介到埃及的。”三是当时埃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图书出版工作，推出了由文化部主持的“千书系列”计划，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官方的“千书系列”和类似《文明的故事》等超大部头名著的代理销售业务。其中也包括大量阿拉伯经典名著。结果，他在埃及出版界崭露头角，生意越做越大。

国内业务的迅猛发展并未冲昏他的头脑，他像每个成功的企业家一样，在一个成功到来之时甚至之前，就已开始谋划下一个成功，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国外。他是最早将黎巴嫩著名的《文学》、《先锋》和《联合》等刊物引进埃及的人，也因此被认定为使黎巴嫩图书畅销埃及的头号功臣。埃及和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两大图书出版中心，各有千秋，一般认为黎巴嫩出版的书籍印刷质量高，装帧讲究，价格也较贵，最重要的是出版的自由度更大。因此，他与常驻黎巴嫩和西方的出版机构建立业务联系，或购买版权翻译出版他们的书，或进口原版书。甚至直接从美英等国购入最新书籍，免受海关和书检部门的查验。毫无疑问，他的这种特权是导致书店顾客盈门和各界名流纷至沓来的原因之一。

在麦德布利认识的名流中，他最喜欢纳赛尔。在开罗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他曾给埃及代表团送报纸幸遇纳赛尔。当时他非常激动，走上前去问候总统，纳赛尔总统非常亲热地拥抱了他，并拍着他的肩膀聊了几句。这是麦德布利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也是他至今自称是一个坚定的纳赛尔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他甚至认为如今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地位不高，全是因为没有了纳赛尔之故。从此，但凡有了政治方面的新书，他都给总统以及总

统的弟弟邵基寄去，邵基也因此成了他的朋友。他坦言最不喜欢萨达特：“我怎么能不讨厌他呢，正是他下令派人封了我的报亭。当年他当《共和国报》总编辑时经常在我这里买书买报，而当了总统之后就因为我出版了他认为是自己对头的人的书，便查封我的报亭！”这件事曾在埃及舆论界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这位惯以倡导言论自由著称、对内开明、对外开放的埃及总统也为此遭到许多人的指责。一位外国著名作家曾就此事评论说：“他怎么能对他的这位公民这样做呢？我们是应当向这位公民脱帽致敬的，因为他出版了那么多的书，自己却睡在大街上。”

他结识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电影明星，就更是数不清了，以至于一位记者曾问他：“怎么我每回来你的书店都能碰上几位名人啊？”他对文艺界的精英们总怀有特殊的敬意，因为当他身处逆境或卷入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官司时，总是这些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从某种程度上说，埃及的知识分子已将麦德布利和他的书店看作是一种象征，甚至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与马哈福兹之间的友谊就是圈内的一段佳话，两人交情之深，堪称莫逆。当被问及马哈福兹为什么不在他这里出书时，他说也曾经试探性的问过，对方说已与另一位出版商有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想中断。麦德布利非常理解，从此再未提及此事。

我是不善于与生人长时间攀谈的，所以见到麦德布利先生后，先是寒暄几句，继而简短地告诉他，我是从中国来的，以前在报刊上看到过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这次从开罗回去后想写一篇文章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老人很高兴，连声称谢，在与老人合影后，我便匆匆回到别处看书去了，毕竟时间有限。

不知什么时候，麦德布利先生慢悠悠地来到我们所在的副店，与大家聊起天儿来。少顷，他吩咐大伙计拿来几本书送给我们，大伙计很认真地在每本书的扉页写上：赠予某某先生（或女士），并祝您进步、顺利——麦德布利书店的主人、经理哈吉·麦德布利。起初我有点奇怪，虽然老人家没上过学，但听说他从20岁起就自学英语，而且至今不辍，外语都学了，国语不可能不会写吧。大概是年纪大了，不便站在那里趴在书上写字，何况还要一一问清来客的名字，因而就让大伙计代劳。但老

人最终还是在每本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送我们的是一本名为《雅古比扬大厦》的小说，作者为阿拉乌·阿斯瓦尼，内容是揭露埃及社会阴暗面的。小说问世后好评如潮。原因之一是开罗城内确有这幢著名大厦，它明显带有纪实色彩。这本小说也是麦德布利书店最近几年出版发行的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自2002年初出版至2005年1月已再版7次。

提到书，不由想起即将离开该书店时的一件怪事。我先把挑好的七八本书放在一个自认为比较显眼的地方，准备最后拿去结账。但终了却不见踪影，没有买成。令我再次感到这里的凌乱，但我当时甚至想这种凌乱是不是故意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书检人员——找着找不着先把你的脖子累拧了，把你的眼看花了。

书丢了，虽说还没付钱，但心里仍存遗憾，尤其是其中的两本，一本是北大仲跻昆老师帮我找的，要知道这体现了多么崇高的精神啊——他本已发誓再不买书的，因为家里实在放不下，当时硬被我们拖了来。如今把他找的书丢了，直到返回下榻的地方，他还在说：“我很伤心，你对我很不重视，竟然把我精心为你挑选的书搞没了。”这本书的名字叫《贾希兹〈吝人列传〉中的社会语汇》，看上去像博士论文，足有40多万字，对我确实比较重要。另一本书是《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被钉死和受酷刑而死的人们》。因前几年读了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我便萌发出写“阿拉伯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想法。如《卡里来和笛木乃》的作者伊本·穆加法是被腰斩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的作者泰伯里死了，亲属不敢在外面下葬，而在自家屋内挖了个坑给埋了。诸如此类都值得一写，只可惜资料太少。这本书不仅可以提供大量这方面的素材，同时还可以借此比较中阿历史上的酷刑，这可能是个较为生冷的比较文化课题。

但愿将来有机会再去埃及，在完成此次“扫盲之旅”后，再作一次“补课之旅”。不是为看更多的古迹名胜，也不是为非要亲身验证那句古老的名言——“喝过尼罗河水的人还会再来”，我只想再一次走进麦德布利书店，找回我在那里“丢”的几本书！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阳）